史籍典录

苏轼与李公麟

真情尽在翰墨中

■ 韩国强

【编者按】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有着说不完的话题，与他有交往和交流的人士大多能名留青史，包括那位可能是最早为其绘就《东坡笠屐图》的画家李公麟。深挖史料和前人诗文，可知苏东坡与李公麟交情颇深，后者在当时也是一位名流，是“好古博学，长于诗，多识奇字”“雅善画”之人，且与苏轼一样，在《宋史》中有传。

苏轼与李公麟都是宋代的大家，两人借由诗画交流、交往，切磋艺术，友情深厚。

苏轼（1037－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眉州（今四川眉山）人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称苏轼的文学作品“浑涵光芒，雄视百代”。

李公麟（1049－1106），字伯时，号龙眠居士，舒州（今安徽怀宁县、潜山县一带）人。《宋史·李公麟传》说他“好古博学，长于诗，多识奇字”“雅善画”。

起初，李公麟绘画并不引人关注，甚至被人指责，但他不以为意。

苏轼《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》，对李公麟画中的“天马”作了生动的描绘，诗句极具推崇李氏马画之能事，“龙膺豹股头八尺，奋迅不受人间羁”“元狩虎脊聊可友，开元玉花何足奇”。

苏轼的另一首诗《次韵吴传正枯木歌》，也极力赞美李公麟画马的技艺：“龙眠胸中有千驷，不惟画肉兼画骨。”

李公麟被人指责作画可耻，而苏轼不顾世俗，称赞李公麟“前世画师今姓李”，才有《宋史·李公麟传》“雅善画”的美誉。

绍圣年间，苏轼遭受沉重的打击，一贬再贬，最后到了海南儋州，遇赦北归时，究竟到哪里安居，他一度举棋不定。据孔凡礼先生考证，苏轼当时考虑住在舒州，后来苏轼到了韶州，李公麟弟弟李公寅（亮工）时为韶州通判，劝苏轼在舒州住下来，于是苏轼卜居舒州的愿望更加坚定，他给李公寅的信中明确表示：“意决往龙舒，遂见伯时为善也。”从一个细节足见苏东坡与李公麟晚年的深厚友情。苏轼北归途中听说李公麟有点咳嗽，十分牵挂，便立马投书问候，并表示未能亲临问候的内疚。

李公麟作为一名画师，他与苏轼的交往更多的是以画（其中一部分为苏轼的画像）传递情感，互动方式有三。

明代朱之蕃临李公麟《东坡笠屐图》（局部）。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一是李公麟绘画，苏轼作文或题诗。《苏轼全集校注》有一篇佚文《李伯时画像跋》云：“初，李伯时画予真，且自画其像，故云‘殿以二士’。已而黄鲁直与家弟子由皆署语其后，故伯时复写二人。”可知李公麟不只画了苏轼和自己，还画了黄庭坚和苏辙。苏轼在《书<黄庭内景经>尾，并叙》中极言赞美李公麟的画：“笔势隽妙，遂为稀世之宝。”

二是两人共同挥笔作画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正月十二日，苏轼和李公麟应柳仲远之请，取杜甫诗“松根胡僧憩寂寞，庞眉皓首无往著。偏袒右肩露双脚，叶里松子僧前落”之意作画，名曰《憩寂图》。

三是李公麟为苏轼画像，且不止一次。

比如苏轼按藤杖坐盘像，画得非常逼真。诚如黄庭坚所云：“李伯时作子瞻按藤杖，坐盘石，极似其醉时意态。当吾辈聚会时开此像，如见其人。”

又如《西园雅集图》。米芾《西园雅集图记》称：“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，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，而人物秀发，各肖其形，自有林下风味，无一点尘埃气，不为凡笔也。其乌帽、黄道服、捉笔而书者，为东坡先生。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，以文章议论、博学辨识、英辞妙墨、好古多闻、雄豪绝俗之资、高僧羽流之杰，卓然高致，名动四夷。后之览者，不独图画之可观，亦足仿佛其人耳。”

再者是金山画像。《金山志》载：“李龙眠画子瞻照，留金山寺，后东坡过金山自题云云。”

再就是后世最为津津乐道的《东坡笠屐图》了。此图描绘苏东坡在儋州访黎子云，遇雨，从农家借斗笠戴之，著屐而归的韵事。李公麟《东坡笠屐图》原画已失传，但有明代朱之蕃临李公麟《东坡笠屐图》的画作存世，一幅藏于广东省博物馆，另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学林一叶

张元济创建三座图书馆

■ 周铁钧

张元济1867年生于浙江海盐，清代光绪年间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、总理事务衙门章京等职，1898年因参与维新变法被革职，在致力史典勘修、文化出版工作的同时，先后创建了通艺学堂、东方、合众三座图书馆。

1896年，张元济投身维新运动，提出“今之自强之道，自以兴学为先”，在“自强”“兴学”理念的促动下，用多年积蓄，购买了一批英法等国进步书籍的中文译本，同时在挚友汪康年协助下，从各地购买一批国外思想启蒙、建制立法等方面的文献，还订阅了数十种中外报刊，并与同僚陈昭常、张荫棠等人捐出各自收藏的典籍古本，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。

张元济根据运作实际，制定出《图书馆章程》和《借阅处章程》，对其人员职责，图书管理、分类编目、借阅办法等都作出明确条规，首开中国藏书机构对民众开放，可阅览、借读的先河，也创下了最早的图书馆管理、运行规制条例。

当时，热衷变法的光绪皇帝要阅读一些国外改章建制、法规条律的译本，但宫廷少有这类藏书，便差人去通艺学堂图书馆借阅。皇帝亲自拨款购书，使得图书馆名声大噪，借阅者日益增多。

1898年，维新变法失败，张元济因此被革职，举家迁往上海，通艺学堂图书馆移交给京师大学堂，后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1903年，张元济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，开始广泛向社会征购古籍、方志、史典及外国进步书籍，用以拓展编译所翻译、出版科目，扩大业务范畴。他到任3年多，先后从浙江、广东、江苏等地的书楼、书院购得宋、元、明代的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《晋书》等一大批珍籍善本，编译所逐渐拥有古籍、史典、译本、图表总计33万余册（幅）。

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上，提出“兴建图书馆，对公众开放”的建议，得到了一致通过，并决定由他主持选址置地、开工建设。经过张元济等人2年多的辛劳操持，坐落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5层大楼的“东方图书馆”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，很快成为上海的文化活动中心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日寇飞机轰炸上海，一颗重磅炸弹击中东方图书馆，一时间大楼浓烟滚滚，烈焰腾卷……藏存的图书皆成灰烬。张元济站在没膝深的纸灰中涕泪长流，仰天长叹，他愤恨侵略者的滔天罪行，他痛悲被焚毁的中华文脉，无可挽回的文化浩劫。后来，他将幸存在上海金城银行保险库中的近600种善本珍籍，编辑成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，他解释“烬余”之意时说：“烬余，并非浩劫后剩余之书，而意在‘志痛’也。”

1926年，东方图书馆全貌。 资料图

东方图书馆惨遭浩劫，多年心血付诸东流，并未泯灭张元济对图书馆事业的热衷，他联合上海知名实业家叶景葵、参议会秘书长陈陶遗等人联合发出“创办图书馆意见书”，并很快得到文化、教育界知名人士陈叔通、蒋抑卮、叶恭绰、李拔可等人的加盟支持。张元济在写给上海市教育局《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》的报告中写道：“图书馆命名合众者，取众擎易举之义，各出所藏为创。”

1939年5月4日，张元济主持的“合众图书馆筹备处”在上海挂牌。进入实质运作阶段后，首先要解决的是藏书质量和数量，在加盟人士积极捐献自己珍藏的古籍典卷的同时，广开门路向社会征集各历史时期的名人家谱、日记、手札、档案等。经过近2年的努力，馆藏书已达22万余册，珍籍众多、门类丰富，每天最多要接待读者二三百人，当时知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地质学家、生物学家，如郑振铎、章鸿钊、秉志、钱钟书等人，都常去合众图书馆阅览典籍、查寻史料。

张元济一生创建的三座图书馆，改变了中国传统藏书的封闭状态，首创对外开放的先河，从理念、体制、管理等方面开辟了现代图书馆的运营模式，为传承、延续中华文化、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1949年9月，82岁的张元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读史侧翼

《新青年》与新文化运动

■ 金满楼

110年前，一份名叫《新青年》（原名《青年杂志》）刊物在上海创立。当时的参与者或许没想到的是，这份最初发行量仅一千份的新刊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，并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乃至之后几十年中持续绽放耀眼的光芒。

《新青年》的创办人为陈独秀，字仲甫，安徽怀宁人，他曾于17岁中秀才，后留学日本并参与清末革命。1913年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陈独秀对以往的革命方式感到悲观并认为“救中国、建共和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”。1915年夏，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开始筹备《青年杂志》。在与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商洽无果后，新杂志改由陈子沛、陈子寿兄弟的群益书社出版发行。1915年9月15日，《青年杂志》正式创办成立。发行数期后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认为其与名下刊物《青年》《上海青年》太过接近而要求改名。由此，《青年杂志》在1916年9月第2卷后改名《新青年》。

在创刊词《敬告青年》中，陈独秀提出“新青年”的六个标准：“自由的而非奴隶的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，世界的而非锁国的，实利的而非虚文的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”1916年改刊后，陈独秀又发文号召青年做“新青年”，其中提出更为具体的标准：生理上身体强壮，心理上“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”；“内图个性之发展，外图贡献于其群”；以自力创造幸福，而“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”。陈独秀还同时指出，要摆脱蒙昧，“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。”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所揭橥的“民主与科学”两大主题（“德先生与赛先生”）。

1917年1月，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也随着迁往北京。1918年1月，《新青年》宣布改组，由之前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轮流编辑（陈独秀负总责），并且不再接受外稿，也就是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。此后，李大钊、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等人相继参加编辑部，《新青年》开始进入全盛时期。

1917年后，在北大教授钱玄同的再三邀请下，任职于教育部的鲁迅开始为《新青年》撰稿。之后，鲁迅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6首新诗，不过此举只是聊壮声势，于寂寞中“敲敲边鼓”。真正让鲁迅一举成名的是白话文小说，这就是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5期上发表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后者以意识流的写作方式揭露了封建礼教的“吃人”本质。此后，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，他先后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54篇作品，其中包括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风波》《故乡》等知名作品。

《新青年》的创立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，其早期贡献在白话文、新文学和新思潮方面。白话文自古有之，元明清三代的俗文学包括小说、戏剧、评书等早就采用白话并取得相当成就，但官方及士人阶层仍用文言并以此作为文化地位与身份的象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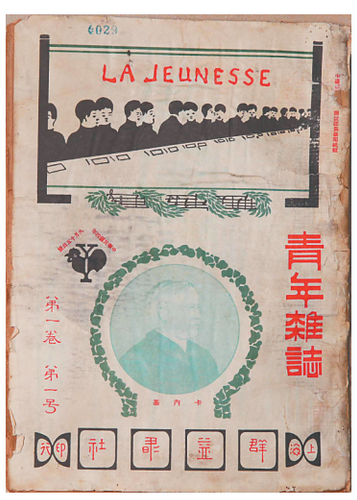
从第4卷第1号开始，《新青年》开始刊登白话文章，并采用新的标点符号。此后，《新青年》的宣言、启事及社论等均使用白话文，以此作为示范。在此时期，文言文章的篇数逐卷减少，白话文章则不断增加。到第7卷后，《新青年》不再刊登文言文章。在提倡白话文的浪潮中，新文学也开始登场。1917年后，《新青年》相继刊出胡适、刘半农、沈尹默三人创作的新诗。此后，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鲁迅、俞平伯等人也都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新诗。1918年5月15日，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，这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。

在此浪潮下，北京《晨报》《京报》《国民公报》及上海《民国日报》《时事新报》等知名报刊也开始大量刊登白话文章，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卓越的成效。1922年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先后通令全国小学及中学国语课本全部改用白话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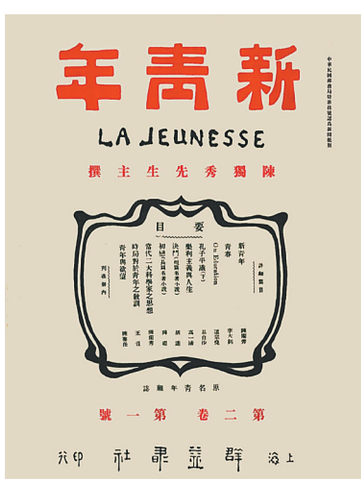
1918年后，在俄国“十月革命”的影响下，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相继发表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》《庶民的胜利》等文章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先导作用。1919年五四运动后，《新青年》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，并分别推出“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”“劳动节纪念号”等。从1919年至1921年上半年，《新青年》共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、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文章130余篇。

1920年9月后，《新青年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，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机关刊物（由陈独秀主编）。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，《新青年》杂志于1922年7月出版至第9卷第6期后停刊。此后，《新青年》作为中共理论刊物重新推出，期间推出季刊和不定期刊共9期。在此期间，杂志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。1926年7月，《新青年》停办，总计出版63期。

在《新青年》的带动下，1920年前后出现了不下50种文学刊物及40余家文学社团，很多作家包括叶圣陶、许地山、老舍、丁玲等也都脱颖而出，俨然有百花齐放之态。



《新青年》创刊号的封面，原名为《青年杂志》。 资料图



《新青年》。《青年杂志》从第二年的第二卷开始更名为《新青年》。 资料图

文博苑

源远流长说熨斗

■ 高永南

2018年4月8日上午，笔者来到海口市永兴镇雷虎岭下，依次踏访儒行、儒任、儒钟、三元村，在儒钟村一座破败宅院的门口小憩。当时，有人从里面走出来，是临时路过祖屋拐进来看看的。攀谈中他抽身离开，不久拿出一个满是锈迹的带木把瓢状物，细看之下，原来是一个铜熨斗，类似的物件在海口几个古玩城时有所见。

昔日能有补丁衣服穿，有半菜半饭吃就算“衣食无忧”。旧时，破衣烂衫要缝补，讲究一点的，或过年过节时，皱巴巴的布衣要浆洗，即搓洗去污后用煮饭沥出的米汤“浆泡”再清洗，晒干后比较挺括。家境好的，特别是乡绅（有功名者）出席约亭宣讲、乡饮酒礼、祠庙祭祀，即使没条件衣着光鲜，但至少要整洁并尽量平直体面，这就离不开熨斗。

老式熨斗的用法很简单。斗、勺状平底容器内备火炭，平底厚重（施压）宽大（功效快）光滑（便移动），再在桌案平铺衣、料上喷水雾至湿润，然后移动烫熨。

得到钟姓宅院主人慷慨转让后，笔者将熨斗带回海南民俗博物馆搁置，一直没拿它太当回事，只是陈列在老馆5楼《古老的工具》固定大展柜内。2023年，观看央视四频道《国宝·发现》栏目10月13日播出的《融合的印记》后，笔者又惊又喜，原来熨斗所来有自。

熨斗身世非凡，据说它源起商纣王炮烙之刑，久而久之，残忍的炮烙记忆被人们选择性屏蔽，只留下创造美好生活的日常用具，名曰熨斗。有人考证，长沙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苎麻织品是用熨斗熨烫过的，2000多年来这件衣服依旧平整、华美，今人仍可从中窥探辛追夫人当年的容光，毕竟她所处的西汉，熨斗早已广泛使用。

从商周、战国、汉朝宫廷走出的青铜熨斗，其纹饰同样比照青铜礼器纹饰制造，即使民间铸造也一以贯之。

儒钟村熨斗用于装木柄的吞口为瑞兽麒麟，即獬豸，湖南张家界实力派鉴赏者杨年华君认为：器身铸两组相对四只鸱鸮纹（猫头鹰）商代它象征战场上的胜利与强大战斗力，其最早的图腾意义可追溯到商代宗庙重器上主体纹饰，承载神圣意义。

鸱鸮纹鸟尾处“入”“人”字形纹饰似为方折雷纹的纵向压缩变体。商周青铜器上的标准雷纹多作回旋方折状，而战国工匠为适应小型器物表面，将原本横向延展的雷纹单元垂直压缩，形成类似“入”字的锐角结构，鸟、“入”字纹，可构成“鸟喙啄雷”的意象组合，隐喻神鸟掌控自然。

儒钟村熨斗器口除翻沿滚边装饰、加固外，器身正中凸起卷云纹装饰，加固斗（勺）身后部承重及柄部前沿延伸高起，以遮挡炭火的灼热。卷云弯钩状突起在青铜器术语中通常被称为“扉棱”，其形制、纹饰风格及锈蚀程度可认定为清中期作品。

2024年9月，海南民俗博物馆新馆开馆，儒钟熨斗因家世显赫得享专柜专版隆重展示。

此外，海南民俗博物馆还馆藏其他几柄铜熨斗：一只板底径宽9.5厘米，器身万字符“卍”纹锦地开窗装饰五朵太阳花蕊盛开；一只板底10.8厘米，器身“回”纹锦地装饰三组倭角正方框中铸夔龙纹（一说为分解式饕餮纹），其特别处在于吞口铸为麒麟还再捏塑装饰独角（早期麒麟为独角）和双耳等，笔者在海南仅见孤例，它俩年份约为清晚期；更晚至民国的另有板底宽14.2厘米，器身、把处光素无纹饰的熨斗，可能是城镇裁缝铺、成衣店工具；一只底板10.6厘米熨斗，用锤揲工艺加工，器身与把用铆钉连接，周身光素无纹。

及至近现代，一种生铁铸造、状若青瓷虎子、后下开小炉门、前上留烟囱的船形熨斗问世，因其造型简单、材质便宜，得到普及。19世纪末，美国发明电熨斗，百年后铜熨斗销声匿迹，生铁熨斗也消失不见。

海南民俗博物馆馆藏的铜熨斗。 高永南 摄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3时18分 印完：6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